

文化
中国与世界
CULTURE CHINA AND THE WORLD
新论

王铭铭 著

人生史与人类学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甘 阳 主 编

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

*

人生史与人类学

王铭铭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生史与人类学/王铭铭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0. 11
(“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
ISBN 978-7-108-03554-7

I. ①人… II. ①王… III. ①人类学—研究 IV. ①Q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0517 号

责任编辑 舒 炜
封扉设计 宁成春 崔建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11.375
字 数 182 千字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26.00 元

“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

缘 起

百年前，梁启超曾提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以及“世界之中国”的说法。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世界之中国”或“亚洲之中国”的各种说法益发频频可闻。

但所谓“中国”，并不仅仅只是联合国上百个国家中之一“国”，而首先是一大文明母体。韦伯当年从文明母体着眼把全球分为五大历史文明（儒家文明，佛教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的理论，引发日后种种“轴心文明”讨论，至今意义重大。事实上，晚清以来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从未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简单看成是中国与其他各“国”之间的关系，而总是首先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看成是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

特别是强势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二十年前，我们这一代人创办“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时，秉承的也是这种从大文明格局看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视野。

这套新编“文化：中国与世界”论丛，仍然承继这种从文明格局看中国与世界的视野。我们以为，这种文明论的立场今天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迫切了，因为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将消解所有历史文明之间的差异，绝不意味着走向无分殊的全球一体化文明，恰恰相反，全球化的过程实际更加突出了不同人民的“文明属性”。正是在全球化加速的时候，有关文明、文化、民族、族群等的讨论日益成为全球各地最突出的共同话题，既有所谓“文明冲突论”的出场，更有种种“文明对话论”的主张。而晚近以来“软实力”概念的普遍流行，更使世界各国都已日益明确地把文明潜力和文化创造力置于发展战略的核心。说到底，真正的大国崛起，必然是一个文化大国的崛起；只有具备深厚文明潜力的国家才有作为大国崛起的资格和条件。

哈佛大学的张光直教授曾经预言：人文社会科学的21世纪应该是中国的世纪。今日中国学术文化之现状无疑仍离这个期盼甚远，但我们不必妄自菲薄，而应看到这个预言的理据所在。这个理据就是张光直所说中国文

明积累了一笔最庞大的文化本钱，如他引用 Arthur Wright 的话所言：“全球上没有任何民族有像中华民族那样庞大的对他们过去历史的记录。二千五百年的正史里所记录下来的个别事件的总额是无法计算的。要将二十五史翻成英文，需要四千五百万个单词，而这还只代表那整个记录中的一小部分。”按张光直的看法，这笔庞大的文化资本，尚未被现代中国人好好利用过，因为近百年来的中国人基本是用西方一时一地的理论和观点去看世界，甚至想当然地以为西方的理论观点都具有普遍性。但是，一旦“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倒转过来以中国文明的历史视野去看世界，那么中国文明积累的这笔庞大文化资本就会发挥出其巨大潜力。

诚如张光直先生所言，要把中国文明的这种潜力发挥出来，我们需要同时做三件事，一是深入研究中国文明，二是尽量了解学习世界史，三是深入了解各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有了这三个条件我们才能知所辨别。做这些工作都需要长时间，深功夫，需要每人从具体问题着手，同时又要求打破专业的壁垒而形成张光直提倡的“不是专业而是通业”的研究格局。这套丛书即希望能朝这种“通业研究”的方向做些努力。我们希望这里的每种书能以较小的篇幅来展开一些有意义的新观

念、新思想、新问题，同时丛书作为整体则能打破学科专业的篱笆，沟通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着重在问题意识上共同体现“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西方，重新认识古典，重新认识现代”的努力。

之所以要强调“重新认识”，是因为我们以往形成的对西方的看法，以及根据这种对西方的看法而又反过来形成的对中国的看法，有许多都有必要加以重新检讨，其中有些观念早已根深蒂固而且流传极广，但事实上却未必正确甚至根本错误。这方面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例如，就美术而言，上世纪初康有为、陈独秀提倡的“美术革命”曾对 20 世纪的中国美术发生很大的影响，但他们把西方美术归结为“写实主义”，并据此认为中国传统美术因为不能“写实”已经死亡，而中国现代美术的方向就是要学西方美术的“写实主义”，所有这些都一方面是对西方美术的误解，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现代美术的误导。在文学方面，胡适力图引进西方科学实证方法强调对文本的考证诚然有其贡献，但却也常常把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引入死胡同中，尤其胡适顽固反对以中国传统儒道佛的观点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的立场更是大错。例如他说“《西游记》被三四百年来

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认为儒道佛的“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敌”，但正如《西游记》英译者余国藩教授所指出，胡适排斥儒道佛现在恰恰成了反讽，因为欧美日本中国现在对《西游记》的所有研究成果可以概观地视为对胡适观点的驳斥，事实上，“和尚，道士和秀才对《西游记》的了解，也许比胡适之博士更透彻，更深刻！”

同样，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认识仍然远远不够。这里一个重要问题是西方人对自己的看法本身就在不断变化和调整中。例如，美国人曾一度认为美国只有自由主义而没有保守主义，但这种看法早已被证明乃根本错误，因为近几十年来美国的最大变化恰恰是保守主义压倒自由主义成了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具有广泛民众基础而且有强烈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倾向的美国保守主义，几乎超出所有主流西方知识界的预料，从而实际使许多西方理论在西方本身就已黯然失色。例如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预设之一是所谓“现代化必然世俗化”，但这个看法现在已经难以成立，因为正如西方学者普遍承认，无论“世俗化”的定义如何修正，都难以解释美国今天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自称相信宗教奇迹、相信上帝的最后审判这种典型宗教社会的现象。晚近三十年来是

西方思想变动最大的时期，其变动的激烈程度只有西方 17 世纪现代思想转型期可以相比，这种变动导致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在被重新讨论，所有的基本概念都在重新修正，例如什么是哲学，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今天都已不再有自明的答案。但另一方面，与保守主义的崛起有关，西方特别美国现在日益呈现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背道而驰的突出现象：知识精英的理论越来越前卫，但普通民众的心态却越来越保守，这种基本矛盾已经成为西方主流知识界的巨大焦虑。如何看待西方社会和思想的这种深刻变化，乃是中国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今天我们已经必须从根本上拒斥简单的“拿来主义”，因为这样的“拿来主义”只能是文化不成熟、文明不独立的表现。中国思想学术文化成熟的标志在于中国文明主体性之独立立场的日渐成熟，这种立场将促使中国学人以自己的头脑去研究、分析、判断西方的各种理论，拒绝人云亦云，拒绝跟风赶时髦。

黑格尔曾说，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近百年来我们过于迫切地想把自己纳入这样那样的普遍性模式，实际忽视了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同时，我们以过于急功近利的实用心态去了解学习西方文明，也往往妨碍了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西方文明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21 世纪

的中国人应该已经有条件以更为从容不迫的心态、更为雍容大气的胸襟去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

承三联书店雅意，这套新编论丛仍沿用“文化：中国与世界”之名，以示二十年来学术文化努力的延续性。我们相信，“文化”这个概念正在重新成为中国人的基本关切。

甘 阳

2007 年中秋于杭州

目 次

致 谢_____ 1

绪 论_____ 4

从“当地知识”到“世界思想”

——对民族志知识的反思_____ 84

线条与结构，人物与境界

——文明、历史形态与人生史_____ 161

士、文章与大一统

——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看人生史_____ 236

参考文献_____ 340

致 谢

作为一位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之所以对人生史产生浓厚兴趣，背景有三：

其一，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的一个十年，我在福建、台湾城市与乡村地区从事人类学田野工作，期间，我意识到，对于地方上“杰出人物”的认识，是理解地方上由各种社会力量交织起来的“整体”的关键。基于这一观察，我曾于1994年设计有关“魅力型权威”（charisma）的国际合作科研项目，自己也获得一个对人生史做历史与民族志探讨的机会。

其二，1990年代中期，我接触到许多国内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从中感到，社会科学的民粹主义，局部已以各种变相的形态，成为国内“新史学”与社会科学的某个大局部的主导思想。有鉴于此，我转向历史

人类学家从神话学引申出来的理论解释体系，试图以此为基础，在所谓“社会”有“差序格局”的内外上下关系体系中，展开“以人物为中心”的人类学研究。

其三，1990年代末以来，我转向西南地区研究，在这个广大地区，我接触到了民族学与海外“族群人类学”，并依据前人的相关书写，进行了频繁的行走，期间感到，“以人物为中心”的研究方式，实在重要，但却不易被包括年轻一代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内的学者认可。是什么“知识的力量”推使一代代社会科学研究者坚守其所习惯的、与具体的整体人物无关的“体系研究”？为了“解惑”，我继续“以人物为中心”的思索，特别是对社会人类学传统中关于“人这个类别”（person）进行“反思性继承”思考，对社会科学的“人的无名化”之成因展开探究。

对于以上具体背景之“生成”有贡献的人与机构很多，择其要者，人这方面，有费孝通、Marshall Sahlins、Stephan Feuchtwang、郑振满、杨念群、潘乃谷、和少英、李绍明等教授，机构这方面，有支持我东南沿海人类学研究的伦敦大学、伦敦城市大学，有邀请我充任访问教授的芝加哥大学，有促成我西南行走的云南民族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我借此机会

向这些人物及机构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我写作此书各篇论文时，我的学生杨清媚、张帆、舒瑜等给予过重要帮助，对此，我十分感激。

王铭铭

2009年3月7日

绪 论

我推崇“人生史”这个概念。

“人生史”指的是一种不怎么像社会科学的方法，它不同于“量化研究”，虽则相比更接近“质性研究”，却与之差异也大。

“人生史”这个概念，可以译为“life history”。最能表达其中奥妙的，莫过于“life”这个词了。不过，我用“life”这个词时，比一般用法远为郑重。所谓“life history”（一般译为“生活史”），容许的研究法比较多，即使只研究“生活”中的一瞬间，也都可以叫做“life history”。用人类学的有关观点来看，“生活史”，大体有注重人生过渡阶段这种被人类学家叫做“人生礼仪”的“非常时间”的，也有注重人生过渡阶段之外的种种“日常时间”的。大凡关于某群被研究

者经历的时间，都可视为是“生活史”的对象。这样的“生活史”，与我所说的“人生史”，二者大不相同：不管别人有没有说过同类看法，我的主张是，“人生史”研究有一个明了的前提，即，被选择的个别人物的整体一生。

什么是“整体一生”？那也就是被选择的人物生死之间的生活。

这个意义上的“人生史”，与古代中国的“人物志”是有相通之处的。我的追求是历史方面的，以为，要做好“人生史”的研究，最好是选择一位重要，却并非是路人皆知的“非常人”为对象，围绕这个人物，穷尽相关文献，进行相关口述史或口承传统（如传说、传闻、谣言、访谈）研究，将零碎的信息当作“补丁”，恢复该人物一生经历的所有事，一生所想象的物，制作某一“history of a life”。

人的一生既不可能没有变化。人生的变化，有些可以预期，比如，通过渐次升学而变为有职业和地位的“人才”，有的不可或难以预期，比如，意外的风波、升迁、“成圣”、隐居。无论是可以预期的还是不可以预期的，“人生史”所触及的事项，不可能不与“变”这个概念有关。

这一观察给社会科学家带来的挑战够大。社会科学家以研究“整合的秩序”为宗旨，以诸如社会、文化、经济、政体这类概念，将所有人的人生套到一个“整合的秩序”中。这些年来，不少社会科学家对自己的研究方式进行反思，揭示出这类“科学”，受制于近代国族这一“整合的秩序”的制约。为了重新构思社会科学，有提出了超国族的世界体系和区域体系的综合研究方案。置身社会科学核心观念地带的社会学，则反复强调“社会”概念的不足，企图将研究导向游离于“整合的秩序”之外的“能动的个体”。“人生史”固然可以说跟这些再思考都有关系。可是，“人生史”却在本质上不同于这种个人、社会（可与国族合并）及世界的“空间单位化”做法，也不同于其在个体中寻找“社会化”、社会中寻找“整合机制”、世界中寻找“阶级体系”的思路。对“人生史”研究者而言，这三类规模不等的“空间单位”，都是紧密关联的，如同古人所说的“家国天下”，而我们观察这种关联的最好不过的方法，是人生。

对整体的人生的关注，不同于现代社会对于个体的关注。现代社会之所以“照顾”个体，是因为要文明地在关怀个体中消灭个体，促成结构对个人的“全权监控”。在这个社会学的视野中，“人生史”若有意义，便